



越文化研究丛书

吴从祥 著

六朝会稽 贺氏家族研究



越文化研究丛书

吴从祥 著

六朝会稽 贺氏家族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会稽贺氏家族研究/吴从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61-6865-3

I. ①六… II. ①吴… III. ①家族—文化研究—绍兴市—六朝时代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818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武兴芳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六朝时期，会稽本土出现了一系列的世家大族，这些世族多以儒学闻名于世，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山阴贺氏。会稽山阴贺氏历来被视为六朝时期会稽著名世家，并获得了较好的声誉。王伊同《五朝门第》云：“会稽贺氏，儒学望族，实并具之。”^①李慈铭云：“山阴贺氏，自晋司空循，至孙道力，曾孙损，玄孙场，场子革、季，及从子梁太府卿琛，六世以三礼名家，为南土儒宗。”^②贺循、贺场、贺琛皆为一代著名礼学大师，深得当时与后世称赞。虞预《晋书》称贺循为“一时儒宗”^③，何法盛《晋中兴书》称其为“江表儒宗”^④，《晋书》本传称其“当世儒宗”，陈戌国称其为晋代最有权威的礼学家^⑤。六朝三百七十年的礼学成就，以晋代中期最著，贺循又是此期佼佼者；贺循礼学卓然成一世之首；于魏晋名家中，最为精审。^⑥《梁书·儒林列传序》：“为时儒者，严植之、贺场等首膺兹选。”贺琛与其伯父贺场、堂兄贺革素有“梁朝三贺”之美誉。贺循丧礼学、贺场《礼记》学以及贺琛谥法学等，不仅为一代学术经典，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为后出礼学著作大量引用。

① 王伊同：《五朝门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

②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64页。

③ 《三国志·贺邵传》注引。（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59页。

④ 《太平御览》卷二四三引。（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52页。

⑤ 参见陈戌国《中国礼制史》（魏晋南北朝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⑥ 柯金虎：《贺循及其礼学》，《玄奘人文学报》2004年第3期。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对于山阴贺氏，学者们作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贺氏著作辑佚。会稽山阴贺氏，如贺循、贺场、贺琛等都著述甚丰，可惜这些著作均早已亡佚。学者们对贺氏著作进行了广泛的辑佚。严可均《全晋文》收录贺循文章四十一篇。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贺循《贺氏丧服谱》一卷、《葬礼》一卷、《贺氏丧服要记》一卷、贺场《礼记新义疏》一卷。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辑有贺循《贺氏丧服谱》一卷、《宗议》一卷、《答庾亮问宗议》一卷。王谟《汉魏遗书钞》辑有贺琛《谥法》一卷，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有贺循《会稽记》等。另外，台湾学者柯金虎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礼学书考佚》对贺循、贺场、贺琛等的著述作了考辨。^①（2）贺氏家族研究。对于六朝贺氏谱系，学者们作了认真梳理。清人周嘉猷的《南北史世系表》一书中有《会稽山阴贺氏世系》，王伊同的《五朝门第》一书载有《会稽山阴贺氏世系婚姻表》，刘淑芬的《六朝会稽士族》一文载有《山阴贺氏表》，傅振照的《绍兴思想史》一书载有《六朝贺氏家世梗概》，渠晓云的《六朝文学与越地文化》一书附有《六朝会稽山阴贺氏世系表》。对于贺氏家族，学者们也作了一些研究。刘淑芬的《六朝会稽士族》一文认为：“山阴贺氏自东汉以来，即为经学名家，但一直到南朝末年为止，贺氏的门第始终不高，仅能算是下级士人而已。……贺氏一族则除了贺循、贺琛外，皆未至显位，可显示其非高门。”^②王永平的《“江表儒宗”：会稽贺氏之家风与家学》一文对贺氏“奉公贞正”的从政风操以及贺氏礼学传统作了论述。^③渠晓云的《六朝文学与越地文化》一书从文学的角度对贺氏的文学成就作了简要分析。^④（3）贺氏经学研究。柯金虎的《贺循及其礼学》一文，依据其内容对贺循礼学思想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并简要地概述了贺循礼学的特征。^⑤邹远志在一系列论文中对晋代礼学多个议题

① 柯金虎：《魏晋南北朝礼学书考佚》，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大学，1984年。

② 刘淑芬：《六朝会稽士族》，载其著《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268、269页。

③ 王永平：《“江表儒宗”：会稽贺氏之家风与家学》，《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6期。

④ 渠晓云：《六朝文学与越地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384页。

⑤ 柯金虎：《贺循及其礼学》，《玄奘人文学报》2004年第3期。

作了论述，这些论文多言及贺循的礼学思想。《略论两晋兄弟相承应否为后议题》论及贺循兄弟不相继为后的观点，^①《论两晋天子宗庙迁毁议题》论及贺循的宗庙观，^②《论两晋礼家关于立宗资格的分歧》一文论及贺循的宗法思想。^③邹远志的博士论文《经典与社会的互动：两晋礼学议题研究》对晋代众多礼学议题作了论述，其中在论述宗法、宗庙、丧服等议题时，多涉及贺循思想观点。^④张焕君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研究》亦多论及贺循丧服思想。^⑤何希淳的《〈礼记正义〉引佚书考》一书对《礼记正义》所引贺场《礼记新义疏》42条进行了简单考辨。^⑥傅振照的《绍兴思想史》一书对贺氏礼学思想作了简要概说。^⑦简博贤的《今存南北朝经学遗籍考》一书对贺场《礼记新义疏》作了评说：“贺氏疏注，颇能抉别疑似，择善为说；此其有功经注也，”贺氏疏注以宗郑为主，实“郑氏功臣也”。^⑧焦桂美的《南北朝经学史》一书认为“通观贺氏（场）《礼记新义疏》，其治经特色主要有二：宗郑为主，重立新说”，^⑨并对此展开了论述：“贺场《礼记新义疏》以郑学为宗，郑注之外，亦未见援引他家之说”；“贺氏多申说郑注，而郑氏礼学尤精，故贺氏之说后来居上，创见较多”，并认为贺场是“守郑注较严的一派”。^⑩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认为贺氏“贺循之后在南朝世代以专门《礼》学著称”，“贺场亦撰《易》《老》《庄》三玄的讲疏，而保存在《礼记正义》中的贺场之说，有一些颇带着玄学气味，但其为庆氏《礼》之传袭却是主要的一面”^⑪。

① 《略论两晋兄弟相承应否为后议题》，《求索》2008年第11期。

② 《论两晋天子宗庙迁毁议题》，《北方论丛》2009年第6期。

③ 《论两晋礼家关于立宗资格的分歧》，《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④ 邹远志：《经典与社会的互动：两晋礼学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大学，2010年。该论文现已出版，《两晋礼学议题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⑤ 张焕君：《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8年。

⑥ 何希淳：《〈礼记正义〉引佚书考》，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6年版。

⑦ 傅振照：《绍兴思想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4—139页。

⑧ 简博贤：《今存南北朝经学遗籍考》，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36页。

⑨ 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

⑩ 同上书，第249、250、251页。

⑪ 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360—361页。

虽然学者们对会稽贺氏作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辑佚不完备。虽然马国翰、王仁俊、王谟等学者对贺循、贺瑒、贺琛等人的著作进行了辑佚,但这些辑佚不完备,且有误辑。其二,研究不全面。专门研究贺氏家族的论文仅王永平的《“江表儒宗”:会稽贺氏之家风与家学》一篇。简博贤、焦桂美等学者的经学专著对贺瑒《礼记新义疏》作了论述。一些研究魏晋南北朝丧礼的学位论文多论及贺循丧服思想,但仅作为材料加以引用,往往零散而不成系统。至于贺琛等人的礼学思想以及贺氏礼制建设贡献等,学者们较少言及。其三,方法较单一。学者们多以史学研究方法为主,较少兼采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研究的深度与结论的可信性。

(二)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本课题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与价值:(1) 促进六朝世族研究。会稽贺氏虽非六朝时期一流高门,却很好地体现了江南文化世家的本色,是江南文化世家的典范,对其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助于将六朝世家研究引向深入。(2) 促进六朝礼学研究。会稽贺氏是六朝时期著名的礼学世家,礼学大师辈出,礼学著述众多,并对六朝礼制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贺氏家族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显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六朝礼学的认知与理解。(3) 促进浙江文化研究。六朝时期,会稽本土文化世族有山阴孔氏、余姚虞氏、山阴贺氏等。贺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学术传统、家族风尚等都典型地体现了浙地文化特色。对贺氏家族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将有助于浙江文化研究更深层化、细致化。此外,本课题研究对于六朝士人心态、士族政治、社会风尚等研究亦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三)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课题以六朝时期会稽山阴贺氏家族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从家族宏观考察与个案微观研究两个方面来展开本课题研究。

(1) 家族宏观考察。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编制更为完备的《贺氏谱系表》和《贺氏年表》,从而对贺氏兴衰等有着清晰的认知。其次,对贺氏家族成员的官职变迁、社会交游等作详细考察,从而对贺氏家族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等有着清晰的认知。再次,在《隋书·经籍志》

以及后人补编的六朝《艺文志》的基础上,详细考证贺氏著述,并对这些著述进行分类统计,从而对贺氏礼学世家的特征有更清晰的认知。最后,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将贺氏与本土虞氏、孔氏、沈氏以及吴郡陆氏、顾氏等进行比较,从宏观上对贺氏家族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学术传统等有一较为清晰的认知,从而对贺氏家族特征有更深刻的认知,并揭示这些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

(2) 贺循、贺瑒和贺琛个案研究。首先,在前人辑佚的基础上对贺循、贺瑒和贺琛的著作进行补辑或重辑,从而获得更为完整、可信的著述文本。其次,细致考察贺循、贺瑒和贺琛等人的性格特征、处世方式、入仕心态等对个人升迁及家族发展的影响。再次,在精读贺循、贺瑒和贺琛的著作的基础之上,归纳出他们的治学重点、经学思想、解经特色、缺陷不足等。最后,礼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借助《晋书》《梁书》《通典》等文献记载以及贺循、贺瑒和贺琛等人今存的礼学著作,详细考察他们的礼制建设贡献。

本课题以贺氏家族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贺循、贺瑒、贺琛等人个案为研究重点,对六朝时期会稽贺氏的学术思想、学术特征、学术传统等作较为全面的研究,以此透视六朝会稽世家发展情形,揭示当时学术世家艰难的发展道路,从而将六朝地域世家和浙江文化研究推向纵深。为了很好地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课题研究兼采多种研究方法,择善而从,择需而取。(1) 大量采用量化统计法,以可信的统计数据来证明观点。对于贺氏仕职升迁、文章著述等研究即采用此法。这可使得贺氏家族特征得到清晰、鲜明的展现。(2) 将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相结合。在研究贺循、贺瑒等人礼学思想时,将纵向对比和横向对照相结合,将发展史的纵线与时代横截面相结合,从而给他们的学术成就以公正、客观的评价。(3) 以文献考证和思想史研究方法为主,兼采用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方法。

(四) 对于相关问题的一些说明

(1) 关于“六朝”,历来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六朝”指的是3世纪初至6世纪末,建都于建康的六个历史朝代: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种提法有着浓郁的地域意识,因此其对于地域历史研究是比较

适合的。中国历史自三国以降，先历西晋，再入东晋。将西晋一朝摒弃必将使人产生历史“断裂”之感。^①正因如此，继而有学者提出广义“六朝”之说，即指两晋南北朝。本书所言“六朝”是广义的，即指的是两晋南朝时期。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无法以朝代的更替来作清晰划分的，因此，本书研究有时会上溯至东吴，甚至东汉，下延至隋代，甚至唐初。

(2) 关于材料的使用。本书在史料运用、文献引用等方面，尽量以时间较早的材料为主。由于贺循、贺瑒、贺琛等人著作早佚，今所见皆为后世辑佚本。因此，在使用这些后世辑佚本时，一方面尽量核对原文，另一方面尽量直接引自其原始出处。

(3) 为了节省篇幅，本书所引常见古代典籍一般随文作注，不一一注明版本、页码等，其版本参见文后“主要参考文献”，对于可能会引起歧义、误解或不易查找的引文，则详细标明版本、卷数、页码等。

(4) 对于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著作、学位论文、学术论文等，均详细注明出处，一示不掠人之美，二为便于查找核对。

(5) 本书对前贤方家研究成果吸纳颇多，在此先予以致谢，如标注或有疏误，敬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便及时纠误、致歉。

^① 事实上持狭义“六朝”观的学者并未能完全摒弃西晋这一历史时期，只不过是将其作简单处理罢了。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六朝会稽士族概说	(1)
第一节 东汉时期会稽士人的兴起	(1)
第二节 东吴时期会稽士族	(10)
第三节 两晋时期会稽士族	(19)
第四节 南朝时期会稽士族	(27)
第二章 贺氏家族兴衰	(36)
第一节 贺氏溯源	(36)
第二节 魏晋时期贺氏家族	(40)
第三节 南朝时期贺氏家族	(46)
第三章 贺氏家族考辨	(50)
第一节 政治仕进	(50)
第二节 社会交游	(65)
第三节 文章著述	(72)
第四章 贺循礼学	(84)
第一节 贺循入仕心态及其影响	(84)
第二节 贺循礼学渊源	(91)

第三节 贺循礼学思想(上)	(100)
第四节 贺循礼学思想(下)	(122)
第五节 贺循礼学特征	(144)
第六节 贺循礼学影响	(154)
 第五章 贺场礼学	(167)
第一节 贺场与齐梁礼制建设	(167)
第二节 《礼记新义疏》考辨	(170)
第三节 《礼记新义疏》	(177)
第四节 贺场礼学影响	(189)
 第六章 贺琛礼学	(215)
第一节 贺琛人格与心态	(215)
第二节 贺琛礼学思想	(222)
第三节 《谥法》	(227)
 结语	(242)
 附录一 贺氏谱系表	(247)
 附录二 贺氏年表	(248)
 附录三 贺氏著述辑佚	(260)
 附录四 贺氏评论选辑	(286)
 主要参考文献	(289)

第一章 六朝会稽士族概说

早在史前时期，于越先民便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如良渚文化等。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乃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传二十余世至越王允常。允常之子勾践败吴，北上争霸，成为一代霸主。勾践以降，越国渐衰。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威王杀越王无彊，灭越。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王翦灭楚，越归于秦。自上古以来，会稽一直是于越的文化重心。自秦汉以降，以会稽为中心的越文化涅槃重生，不屈不挠的会稽士人再次兴起，以其胆剑精神创造了独具风貌的越地文化，成为辉煌的华夏文化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东汉时期会稽士人的兴起

秦灭楚后于吴、越故地设会稽郡。西汉承秦制，仍置会稽郡。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以钱塘江为界，将会稽郡划分为吴郡和会稽郡。会稽郡仍以会稽为治所，主要管理钱塘江以南地域。自秦朝以来，吴越便沦为边缘地带，其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关中及河洛一带。由于地处荒夷、文化落后等原因，西汉一朝吴越名士屈指可数，仅严忌、严助、严葱奇、朱买臣、郑吉三兄弟等十余人。这些名士或以文章著称，或以军功闻名，在文化学术方面并无多少成就。到了东汉时期，儒学在吴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导致吴越士族逐渐兴起。由于各种原因，会稽士人较吴郡士人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并迅速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群体。

一 儒学在越地的传播

在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倡导下，汉武帝一方面重用儒师、经生，另一方面逐步建立经学教育体系，以推动经学发展。在京师设立中央官学——太学，设博士弟子，在各地建立不同形式的官学，同时私学也日渐兴盛。太学、地方官学以及私学是汉代庞大的经学教育体系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为汉代经学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西汉时期，越地经学教育相当落后，少有名儒见于经传。到了东汉时期，由于经学教育体系的完善，越地经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越地经学的发展与经学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东汉时期，经学在越地的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 地方官学

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修建学官于成都市中，通过官学教育使得蜀中大化。“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文翁传》）。汉武帝的这一诏令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①但对地方官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行政等级的差异，地方官学具有不同形态，“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在汉代，虽然地方官学体系不是很完善，但其作用不可忽视，“地方官学的兴起使官方的儒学教育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初步具有了社会教育的规模”^②。自东汉光武帝以来，历任会稽太守等长官的第五伦、任延、张霸、刘宠等都非常重视教化，在会稽设立了不少地方官学。如黄昌因居近学官而学经，“黄昌字圣真，会稽余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学官，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后汉书·酷吏列传·黄昌传》）。由此可见地方官学在传播经学方面的重大作用了。

(2) 私学

私学范围较广，一般认为，不是政府主持的、不使用国家经费的、不在国家学校制度之内的教学活动都可称为私学。西汉时期私学便非常盛

^① 俞启定对此诏令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并认为“即使有的话，至多不过是一种原则上的号召而已”。俞启定：《先秦两汉儒家教育》，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49页。

^② 同上书，第152页。

行,“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赞》)并非夸张,申公“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汉书·儒林传·申公传》),吴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汉书·云敞传》)。自王莽篡汉,大儒往往隐居教授,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到了东汉时期私学则更加兴盛,“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后汉书·儒林列传论》)。如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蔡玄传》);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后汉书·儒林列传·楼望传》);张兴“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后汉书·儒林列传·张兴传》)。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东汉时期,越地私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形式多元。从授经的主体来看,私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客居经师,另一种是本地经师。相对热闹的北方而言,南方会稽无疑是一片“静土”。两汉之交,许多士人避乱会稽,以至“会稽颇称多士”(《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传》)。太平时期,亦有不少高士隐于会稽,如桓岩等。一些经师客居会稽时往往以教授为生,如王望“客授会稽”(《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本地学子完成学业之后亦有不少归乡里,以教授为生。如王充曾至京师太学受业,学成后“归乡里,屏居教授”(《后汉书·王充传》)。

依据传授的知识不同,汉代私学主要有儿童启蒙教育和专经教育两种类型。在汉代,儿童早期启蒙教育多在入学之前便开始了,如王充“六岁教书”(《论衡·自纪篇》)。在汉代,儿童一般“八岁入小学”(《汉书·食货志上》),如光武帝九岁时,“随其叔父在萧,入小学”^①。东汉时期吴越亦有不少从事启蒙教育的学馆,如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论衡·自纪篇》)。私学专经教育场所多元,主要有学于师所和教于生舍两种形式。包咸曾受业太学博士,因避王莽之乱而归乡里。“太守黄说署户曹史,欲召(包)咸入授其子。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说遂遣子师之。”(《后汉书·儒林列传·包咸传》)黄说欲召包咸入

^① (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页。

授其子，表明达官贵族往往聘经师上门授学；而包咸不愿上门授经，而要求黄说遣子学于其舍，表明经师往往居家收弟子授学。

(3) 出外求学

在师资和条件等方面，地方官学和私学很难与中央学官——太学相比，于是各地有志于学的士子，往往不远千里学于京师太学。正如赵翼所说，遭秦灭学，五经之学皆在太学，“士之向学者，必以京师为归。……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于太学者”^①。东汉时期，吴越远求师学风气较盛。吴越虽然远离京师，依然有不少学士千里迢迢求学于京师。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汉书·儒林列传·包咸传》）。王充“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后汉书·王充传》）。魏朗“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京师长李膺之徒争从之”（《后汉书·党锢列传·魏朗传》）。除了学于太学之外，学子亦求学于博士或名儒。魏朗先学于博士郤仲，后方学于太学。赵晔“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后汉书·儒林列传·赵晔传》）。这些人竞业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常归乡里。王充太学竞业后，归乡里教授，赵晔在师卒后归乡里，魏朗因党禁而归乡里。他们居乡里无疑会促进乡里经学教育的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随着地方官学的增多、私学的兴盛以及远求师学风气的兴盛，东汉时期越地儒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逐渐呈现兴盛状态。

二 会稽儒士学术特征

如上所说，在西汉时期，越地儒学处于沉寂时期，直至东汉时期，越地儒学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传统经学相比，后起的越地儒学更多地带有东汉时代气息。

(1) 在治经理念上，不重家法与师法

先秦以来，各家学说往往以师徒口耳相传为主要流传形式，儒学经传

^①（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六“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1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页。

亦是如此。这样，以宗师为源，弟子逐代相传，从而形成了经学传授体系，即师法。在经学流传过程中，一些经师创立自己的一家之说，即家法。汉代经学传授极重师法家法，“师法家法成为汉代经学研究和传授的最重要的学规”^①，经师往往以师法家法传授，而受业者则要严守师法家法，不得随意更改。师法家法在保证经学的纯正性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师法家法也严重地束缚了学习者的思想与才智，甚至使错误得不到更正而流传不止。到了东汉时期，师法家法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批判，这一时代思潮对越地经学有不少影响。从师承来看，越地名士多有较正规的师传，如严光、王充等曾受业于京师太学，包咸、魏朗等皆受业于博士，赵晔从名儒杜抚习《韩诗》二十年。但他们解经、说经时往往并不墨守师法家法。赵晔所习为《韩诗》，而其所著《诗细历神渊》颇类于《诗纬》。王充《论衡》大量引用各家经说，如《书》曾引欧阳《尚书》、夏侯《尚书》、孔安国《尚书》等，《诗》曾引《齐》《鲁》《韩》《毛》四家，《春秋》则引《左氏》《春秋》《公羊》三家。^②由此可见，会稽儒士说经更重说从己出，而不重墨守师法与家法。

(2) 尚博学，学贯古今与百家

西汉经学尚专，博士往往以一经教授，其他经师亦是如此，而儒生所学往往仅限于一经。专于一经必然导致儒生视野狭隘、学识短浅。到了东汉时期，“专经”逐渐被“通学”所取代。一方面，学者们学贯众经，将各家经说、今古文经说等融于一体；另一方面，学者往往广学诸子百家，以补救经学之弊。博学之风在会稽儒士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并且主张以诸子补经学之不足，《论衡》一书大量引用诸子之学。韩说“博通五经”（《后汉书·方士列传·韩说传》）。贺纯“少为诸生，博极群艺”^③。魏朗“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后汉书·党锢列传·魏朗传》）。赵晔习《韩诗》二十年，著《诗细历

① 俞启定：《先秦两汉儒家教育》，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90页。

② 参见拙著《王充经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210页。

③ 《后汉书·李固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82页。

神渊》之外，又著史著《吴越春秋》。由此可见，尚博学是东汉越地经学的一大特色。

(3) 重讖纬之学

东汉前期，因君主的推崇，讖纬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君主往往以讖决疑，令臣子以讖纬校订《五经》异说。于是儒者争学图讖，图讖之学盛行于世。在此风气影响下，会稽儒士亦颇重讖纬之学，精通纬学众。如韩说“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后汉书·方士列传·韩说传》）。魏朗曾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赵晔著《诗细历神渊》，该书“以历言诗，犹《诗纬》之《泛历枢》也”^①。谢夷吾，学风角占候。班固为文荐之曰：“少膺儒雅，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后汉书·方士列传·谢夷吾传》）。贺纯“数陈灾异”^②。东汉末的虞翻（164—232），则是汉代象数易学的集大成者，他“创立了易学史上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影响至深的象数易学”^③。虞翻易学之精深，颇受时人之赞叹。孔融读虞翻《易注》后答书赞曰：“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三国志·虞翻传》）虞翻《易注》对前代《易》说广为采纳，自然亦多受《易纬》影响。由此可见，重讖纬之学是东汉越地经学的一大特点。

三 会稽士人的兴起

如上所说，东汉时期越地儒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对越地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会稽士人的兴起以及学术思潮与士风的变化等。

(1) 士人群体的兴起

统观西汉一朝，吴越没有产生大儒名师，而到了东汉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今见于范晔《后汉书》的东汉会稽名士有21人之多，史籍明确记载具有经学背景的共12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

① 惠栋语。转引自（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1页。

② 《后汉书·李固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82页。

③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3页。